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 张星炜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 张星炜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张星炜编著, 一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726-778-2

I. 政… II. 张… III. 政治—理论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311 号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ZHENGZHI FAZHAN LILUN YANJIU

编著 张星炜

责任编辑: 邹 苹

内文设计: 杨 潮

封面设计: 武 韵

责任印制: 桑 容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 <http://www.tiandicbs.com>

电子邮箱 ☐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 165mm×230mm

印 张 ☐ 17.5

字 数 ☐ 290 千

定 价 ☐ 32 元

书 号 ☐ ISBN 978-7-80726-778-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01 (市场营销部) 87734639 (总编室)

目 录

引 论 政治发展理论的缘起	1
一、发展的区域性研究的扩展	1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4
三、政治发展理论形成发展的线索和阶段	16
第一章 政治发展理论的主题、流派和基本内容	20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主题即政治发展	20
二、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流派	34
三、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术语	56
第二章 政治民主化理论	65
一、民主与民主化	65
二、民主化的现实模式	75
三、实现民主化的前提条件	79
第三章 政治参与理论	95
一、对政治参与概念的理解	95
二、政治参与的模式	100



三、对政治参与的适度控制	109
第四章 政治稳定理论	112
一、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	112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117
三、影响政治稳定的相关要素	125
四、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	130
第五章 政治制度化理论	133
一、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	133
二、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	146
第六章 政治文化理论	161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缘起	161
二、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	165
三、政治文化的发展	171
第七章 政治腐败理论	177
一、修正主义学派	178
二、后修正主义（功能主义）学派	183
三、后功能主义学派	191
四、新综合派	198
第八章 政治危机理论	209
一、政治发展中的危机	209
二、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	215
三、政治危机的应对策略	234

第九章 政治发展研究涉及的几个重大关系	238
一、考察政治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	238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240
三、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243
四、政治发展中若干变量之间的关系	248
结束语	269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75
后 记	276

引论 政治发展理论的缘起

政治发展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新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以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为研究主题，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如何克服政治腐败、如何化解政治危机、怎样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核心问题而展开学术探讨，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被统称为“政治发展理论”。

对于政治发展理论兴起的缘由，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两种学术潮流的影响：第一种学术潮流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及 50 年代关于发展的区域性研究的扩展，即学术研究中心从欧美转向第三世界；第二种学术潮流是政治学自身的“行为主义革命”^①。

一、发展的区域性研究的扩展

美国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在其著作《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

^① 参见塞缪尔·P. 亨廷顿：《政治发展》，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48～149 页。



程》中指出,至少有7种主要的影响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比较政治学新一轮的关注点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①。这7种主要影响是:(1)政治学对政治行为和 political 中非正式方面——政治社会化、利益集团的行为以及决策——更加重视和强调;(2)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量新兴国家进入世界舞台,扩大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为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全新的实验室;(3)这些新兴的国家都与前殖民地宗主国依然存在直接关系;(4)新的学术整合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增加,发展中国家成为综合研究的最合适的对象;(5)美国政府试图制定一种新的外交战略,以便处理与那些新兴国家的关系,因此,鼓励和要求学者们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社会主义式的发展模式;(6)学者们对于50~60个从未研究过的国家的单纯的求知欲;(7)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喷气式飞行)以及研究基金的增加,使学者们不仅能掌握所研究国度的最新资料,还能同时研究几个国家和地区。

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也来自于第三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理论指导的强烈愿望,即“提供发展策略的需要”。从现实的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民族解放浪潮,将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上了现代化的舞台。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水平,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如何实现农牧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2)如何摆脱殖民主义束缚,建立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3)如何确立现代意义的政治体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政治发展问题有关。

此外,政治发展研究首先兴起于美国,这与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由一个普通的大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使之更加积极地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而当时第三世界的独立正好成为重大的国际现象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为了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特别是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美国政府大量投资,鼓励学者展开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于是,

^① 参见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2页。

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为一种学术潮流。

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也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两个阵营的对立，美国为了孤立苏联，极力争取第三世界，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似乎都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可以用经济方法来解决。另外，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贫困引发政治革命，而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成长，从而避免“红色革命”。因而，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援助，企图通过经济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工业基础，进而提高国民收入，稳定政局，实现民主制度的移植，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和渗透。然而，事实与美国政界、学界的估计不完全一致。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给予援助的国家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1）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不断加剧；（2）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3）军事政变接二连三；（4）反复无常、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人物主宰一切并推行灾难性的社会和经济政策；（5）政治腐败严重；（6）政府效率和公务水平日益下降；（7）政治的权威性严重缺乏。^①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之后的转变，亨廷顿曾对此作了专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② 这就是说，经济发展（包括消灭贫困、疾病和文盲）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实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低微的收效，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问题。正是在这种认识下，政治学家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政治发展的条件和相关要素方面的研究上来。

^① 参见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

^②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一）传统政治学的危机与行为主义革命的到来

在西方政治学中，规范研究（Normative）与实证研究（Empirical）是两种意涵悬殊、风格迥异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学史的角度看，规范研究源远流长，而实证研究，作为一个学派，不过是20世纪初的事。规范研究是古典政治学的生命，没有规范研究，政治学说史上的先哲们所构建的宏大的思想体系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语言堆积，而对规范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也将失去学术上的合法性。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传统无疑可溯及亚里士多德及其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几乎所有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试图同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重新取得联系。”^①作为规范研究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划分政治体的德行标准。他认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②这种观点源于他把政治与国家（城邦）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目的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人和社会制度都有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客观目的，这个目的可以为规范判断提供基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促进某种善业，成就这种善业的共同体便是合乎道德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给出了规范研究的方向：一个政治学家从事的活动大体是规范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回答“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这种“应该”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对本体论所承认的存在领域即所谓“客观真理”的揭示。

这种以规范研究为主旨的传统政治学，大体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研究对象看，国家以及以国家为核心的主权和法律制度是传统

① 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页。

政治学关注的基本内容。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卓有成效地）要求自己一定领土范围内合法地垄断有形暴力的唯一源泉。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乃是力求在国家之间或在一国之内的诸群体间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① 权力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和人民的统一性在传统政治学中完整地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但前者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属性。它是一种高于个人并使个人负有义务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威，布丹及以后的政治学家把它称为主权。国家这个“主权者”在主流学派——自然法学派那里既是契约的产物，也是契约的监护神，它体现为普遍的法律秩序。要认识国家，不能不研究它的法律制度。因此，19世纪以前的政治学又往往被称为“国家之学”、“权力之学”或“政制之学”。

第二，从研究途径看，传统政治学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哲学的、历史的、法律和制度的方法。这和古典政治学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政治学者和古典政治学学者都是一些试图用关于普遍正义的政治秩序的知识来描述、解释、概括有关政治事物本质的“哲学作家”，他们的教育背景、理论素养、学术偏好首先不在于政治学，而在于哲学。哲学是那个时代知识体系的王冠，而政治学不过是他们运用哲学的框架分析政治原因、规划政治现实的副产品。按照政治学家埃里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的说法，一种政治理论要上升到哲学原则，即作为政治哲学，它“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理论”^②。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到托克维尔，哲学、历史与政治的结合这个传统已经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近代政治学不能与之告别的源泉。19世纪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格言就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实际上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③ 至于法律和制度的方法，它们在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内容的规范下，把政治学还原为对制度和法律法典的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①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 Gerth and C. Wright ed.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8.

②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1.

③ 艾伦·C.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第三,学科边界的模糊性。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不仅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动向,反映一个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主要关系以及作为其制约基础的社会分化程度,反过来又对学科的发展及其形态产生巨大影响。传统政治学的第三个特征——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正是由19世纪以前盛行的这种哲学的、历史的、法律的、制度的研究方法决定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学者眼中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哲学王”的构想成为后世精英主义政治魂牵梦萦的大境界;但在文学家看来,它是优美的散文;在哲学家看来,它是智者的沉思;伦理学家则把它视为美德即知识的证明;而历史学家则相信它是城邦生活史料的荟萃。传统政治学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因包容多种学科而模糊了自身学科特色的体系,发展到极致处,手段取代了目的,研究的方法反而成了学科的路标。例如,历史方法的大量使用竟使19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基本上把政治科学视为一门历史的学科”^①。索尔斯坦·范布伦还曾经嘲笑试图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是“无益的浪费”^②。

传统政治学的这种治学品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规范的理论研究成了理论研究的“规范”,其奠基性成果以傲然的姿态引人钦羡。到政治学发源地的欧洲去学习政治学,成为当年许多美国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当传统政治学还陶醉在其声威远播的满足时,它的弟子们已经开始酝酿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之为行为主义革命。它是针对传统政治学的下述危机而产生的:

第一,传统政治学无力回应科学主义的挑战。19世纪中叶,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宣告了“科学世纪”的到来。随着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迅速增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都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因此,观察、归纳、演绎和试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的领域,而且几乎可应用于人类思想与行动的所有方面。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启动了科学主义的思潮。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一切理论都要立足于经验,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予以证实

^① 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②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3页。

或推翻；政治学研究首先要面对政治生活的客观事实，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可予验证的经验理论。这种观点直接针对的是传统政治学的规范性特征。在经验论者看来，规范研究的方法在科学时代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不合时宜了。科学的判断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科学是“价值祛除”的^①。由此而论，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②。传统政治学的“严重的局限性”恰恰在于它不能摆脱或不能超脱价值的规制，在政治研究中往往把“政治理论和价值理论等同起来”，从而显示出与科学主义格格不入的特质。“这种研究的方式”——伊斯顿认为它已堕落成“历史主义”——“由于是从欧洲传统遗传给我们的，已经使政治理论丧失其早先的积极作用”^③。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伊斯顿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家在批评传统政治学的规范性特征时并不简单地否定价值规范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但是他们认为古典政治学奠定的规范研究方向被寄生于此的后世的政治理论家发挥到极致，既损害政治研究的科学精神，也没有解决政治价值观与当前政治现实的关系，其结果是造成了政治学的“贫困化”。

第二，传统政治学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不能解释可能与制度原理相悖的政治过程。伴随着对规范性特征的批判，传统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被置于全面的检讨之中。例如国家——这个被誉为“与政治学共始终的主题”首先受到了来自概念方面的质疑。伊斯顿认为，在以往2500年间很少有一个名称像国家这样存在明显的分歧，沿用含义如此庞杂的概念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缺陷。因此他主张“应当完全放弃国家这个名称”^④。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传统政治学毕竟对国家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前述的“国家三要素说”，虽然这只是一个条件定义，而不是直接定义。然而，用“国家的三要素”（统一的领土、人口和主权）来审察国

① 参见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② 参见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页。

③ 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19页、第220页。

④ 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3页。



家，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的 17 世纪往前溯及人类历史的早期，我们只能得出“并无任何国家存在”的结论。^① 传统政治学把国家作为它的核心研究内容，但国家的条件定义却要限制乃至取消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正是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悖论。许多政治学者认为，从 20 世纪初起，国家越来越不能涵盖政治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国家之外，大量的非正式组织如区域团体、宗教团体、种族团体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传统政治学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此外，传统政治学过于注重从制度和法律文献上来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而没有看到在正式的政治“图式”中政治的运作可以是一个与制度原理相离甚至相悖的过程——事实上，像团体、权力、均衡、妥协、博弈、精英人物、选择与决策、刺激与反应等等这类动态因素可能要比静态的架构对政治的方向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之，传统政治学对国家、主权、法律制度这类“陈旧”主题所作的哲学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无法让人听清政治冰层下汹涌澎湃的潮声。这是它日益式微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传统政治学导致了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溃落。正如一些政治学者所言，不论近代以来的西方有多少种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这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充其量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大体上是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自由主义的原则。也不论自由主义有多少流派，在传统政治学中，它不过是一种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学说，其核心思想大致可以表述为：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而国家则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的政治形式。因此在传统政治学中，自由主义是一种用以评估现存制度、构建理想秩序的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道德哲学，规范性研究把国家与善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人们对这种政治价值的信心。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豪森说：“如果说国家就是人类的道德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唯一保卫者，是从比单纯的男人或者女人更加真实得多的意义上讲的合乎道德的独特组织，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道德秩序呢？”^② 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并号称天性是追求

① 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04～108 页。

② L. T. 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07 页。

自由的白种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残酷奴役，使传统政治学昭示的理想成为一种讽刺。像这样因价值预设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现实相背离而失去学理上的合法性，乃是传统政治学最深刻的危机所在。

于是，政治学革命的时代终于到来。它有一个专有名词：行为主义革命。

（二）行为主义革命的诉求及其贡献

正如传统政治学的危机最初是由科学主义引起的那样，行为主义革命首先也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滥觞的结果。科学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在分析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某种理论或假说必须能够用普遍适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根据这一原则，政治行为主义把政治研究的旨趣定位于经验命题，而不是规范命题。经验命题是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的，因而是可以验证的，即可以判断一个经验陈述是真还是假；而规范命题陈述的是价值判断、个人偏好，是无法验证的。简言之，“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不科学的传统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价值中立”，后者坚持价值至上。因此，政治行为主义认为，在批判传统政治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理论应是分析的，而不是本体的；是解释的，而不是伦理的。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识，政治学即便不能完全祛除价值，“也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或者至少不能把价值视作科学上需要下功夫研究的部分”^①。

从这种观点出发，政治行为主义把自己的研究的基本单位概括为“行为”，而不是制度。在政治行为主义看来，尽管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身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政治学者应该着重关注的是政治机构的活动以及围绕它所发生的行为。即使有一天他们可能需要使用历史资料，或者研究政治体系的法律方面，也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制定、遵守和违反法律的是人，制度不过是行为模式的组合^②。在政治行为的研究是偏重于个体行为还是团体行为上，行为主

① 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

② 参见艾伦·C.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义政治学曾经形成所谓个体论和整体论两种观点。到后来,这种分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部分学者既承认个体行为模型的有效性,也重视团体理论把个人置于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的合理性。事实上,个体行为与团体行为的争议已为将微观层次(个体)和宏观层次(团体)相结合的统一的政治分析模型所替代。

政治行为主义对政治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追求表现在研究方式上主要是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由此发展出许多搜集事实资料的形式,如参与观察、模拟实验、晤面访谈、电话访谈、邮寄问卷、抽样问答等等,也采用了许多处理事实资料的手段,如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算机分析等等。这些方法中,最让政治学者为跻身“科学殿堂”而自慰的无疑是量化的方法。对于政治学来说,没有什么能比量化方法更能考验它向传统告别的决心,也没有什么能比量化方法更能表明它改造自身体系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人的政治行为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权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描述和预测“政治的自由落体运动”,但政治学又必须大体上能够正确地描述和预测政治的变迁和走向,作为数学分支的统计学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政治学科学化的这一欲求。运用数字和量化处理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显著特征。

既然承认政治是经验的、行为的、可以量化处理的,那么,合乎逻辑地也就必然承认政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从这里,政治行为主义得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政治是一个过程。政治是一个过程,意味着政治的实际产品并不是简单地由政治体系规定好的流水线路程序生产出来的,在政治体系的正式运转的背后或外部,游离于形式——法律制度规范的政治过程往往更能显示一个政治体系的实质。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感兴趣的不是描述解释政治的形式,而是政治的实际运用。“政治过程”这一极具革命性的观念“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课题的大规模转移:传统政治学热衷于研究政治制度、宪法、主权、司法机构、国家、制衡等课题;有了政治过程观念的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民意、利益、政党活动、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政策制定、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大众传



播、冲突、革命等等。一种新的观念往往会带来惊人的学术生产力”^①。

政治行为主义从发轫、发展到占主导地位，大概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它面世之初，美国学界不少人认为它是一种偏激的理论。它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强调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导致对某些问题的解释苍白无力，包括前期力主祛除价值的伊斯顿后来也承认，政治研究中实际上无法回避价值，要了解事实总得要借用语言这一概念工具，而概念总是对现实某些特征的有选择的抽象，因而必然包含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成见，它们构成一道认识的屏障，过滤着进入人脑的一切感觉和印象，使人们只能发现符合自己理念的事实。行为主义的这一偏颇，为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线。再如，对数量化手段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反映了新时代政治学变革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它最初大多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部门，如投票选举研究（因为这些部门比较适合量化处理），而在其他部门则受到研究对象的非科学性质（毕竟政治世界不是物理世界）的限制，以致很难使科学方法得以普遍推广^②。因此，政治学在从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的阴影下挣脱出来，开始廓清自己的学科边界的同时，仍然有一个继续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已有丰硕成果的新兴学科中借用概念和框架来丰富自己的任务，而这恰恰只有通过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才能完成。正如伊斯顿所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战斗口号是切中要害和行动起来，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③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行为主义的潮流下，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科学系，培养了大批的以政治行为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行为主义的著作、论文和其他研究课题被广泛引用，尤其随着大批主张和实践行为主义的政治学者逐渐占据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政治行为主义终于遍及政治研究各个领域^④。

①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3 页。

② 参见 Heinz Eulau：《政治学中最易运用行为研究之部门》，见 James C. Charlesworth：《当代政治分析》，正中书局 1981 年版，第 45 页。

③ 转引自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④ 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第一章，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